

第六章 合浦出土的金银、宝玉石串饰与微雕

二、串饰与微雕

汉帝国的南部诸郡中，番禺和合浦是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实际上也是海丝舶来运输的终点，但这两地并不代表是贸易的终点，它们要继续输入内陆走向消费的终端。

合浦郡的兴起时段契合汉帝国着力经营南部贸易的时期。在稍早的时候，合浦偏于番禺西部，临时成为安置犯罪官员的场所。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汉成帝时，罪臣王章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合浦的事件。幸运的是，当时合浦的开发得益于海丝贸易兴起的机遇，待几年之后的政府大赦，他们已经通过经营珠饰事业积累了足以衣锦还乡的财富。^[21]

这个故事中至少蕴含着三个方面重要信息：一是西汉元帝、成帝时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7年），合浦还处于对外贸易的建设时期，帝国可能通过以各类理由和方式从内地强行迁入豪家、贵族，以充斥地方人口，输入先进的文化；二是允许迁入的内地人甚至戴罪者从事珠饰贸易的经济活动，恐怕最重要的是来改变当地的囿于原始采集的经济理念；三是合浦汉墓最早兴盛也是在此之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非常契合。

直到2世纪中期的合浦太守孟尝还尖锐地指出：“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22]由此可知，孟尝所处的东汉末期，合浦郡以珠饰为主的贸易比重很大，可以通过贸易收入来外购粮食。另外，合浦地区两汉伊始便是优质海洋珍珠的重要产地，所以“海出珠宝”其意除指所产珍珠之外，也是表明合浦海丝串饰贸易的繁盛，这些从近年来合浦地区丰富的串饰考古发现可见一斑。

（一）材质类别

两汉时期，介于头和身部之间的装饰品逐步成为女性除特定礼仪外装饰上的需要，是独特而有标志性的特征。此后，多种宝石制品串饰中又加入金银材质，也让汉帝国女性华贵而高雅的装饰增添了张扬而个性的美。

有关合浦出土串饰与微雕的材质，目前可鉴别的有各类人造玻璃，天然半宝石的石榴子石、水晶、绿柱石、肉红石髓、缠丝玛瑙、蚀刻玛瑙（玉髓）以及贵金属的黄金珠饰等。墓葬发现的情况也表明在不同阶段，各类材质出现的数量不尽相同，说明其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深层次蕴含着贸易主体、社会风尚流行的信息。

各类玻璃串饰是大宗商品，时代从西汉中期一直到南朝。颜色以黄、蓝、绿、紫等透明、半透明为主，红色多呈不透明的浑浊状，因配比和着色方式的差异而显不同。从科学监测来看，蓝、绿两色有印度及东南亚制作的混合碱玻璃，黄、绿两色有地中海的钠钙玻璃（俗称“罗马玻璃”）。另有被认为是中等钙铝钾的绿色、紫色不透明玻璃，以铜为着色剂的红褐色玻璃，以锰着色的紫色玻璃，等等，至少料质均认为来自域外。^[23]

能达到宝石级别的石榴子石在中世纪前，仅产于南亚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合浦汉墓出土有少量珠饰和微雕，从料质上来看与南亚所见的无异，无疑应该是通过海路贸易输入，出土墓葬的时代多属于东汉晚期。

实际上，广义的玛瑙（或称为“玉髓”）类包含了肉红石髓、缠丝玛瑙、蚀刻玛瑙，只是其中一些被人类刻意地以特殊方式处理，而得到不同颜色或装饰异常特殊的花纹效果。肉红色石髓是较早合浦见到的串饰质料，同样被青睐的还有利用玛瑙天然缠丝纹路制成的串饰，两者流行时间皆颇长，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到东汉前期还能常常见搭配组合。肉红色石髓呈相对单一的红色，西汉晚期到东汉后少量见到白色与红色石髓共生的矿物组合（图6-9），也常用来制作水滴形的饰件。缠丝玛瑙的颜色很多样，常见为褐色带有白色或黄色缠丝纹，亦能见到纯黑色、近乎不透明的带白色缠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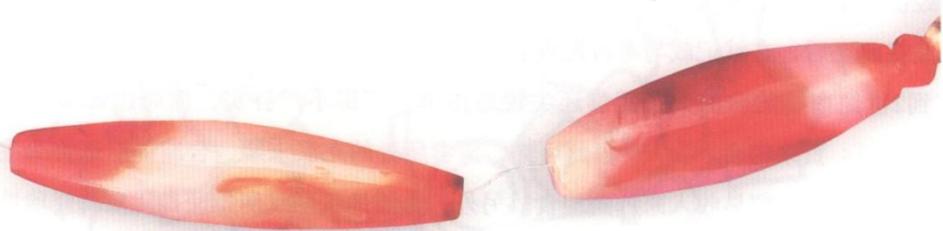


图6-9 合浦北插江盐堆M1出土的串饰（西汉晚期）

蚀刻珠最早出现的原因，不外乎模仿天然缠丝或是人工设计，实际上都蕴含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合浦所见多色玛瑙珠主要有4种形式，如红色、黑色基体装饰白色蚀纹，白色基体则装饰黑色条纹和红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

水晶、绿柱石和尖晶石是近乎透明的半宝石。水晶有白水晶、紫水晶、茶晶和黄水晶，其中以纯透明的白水晶数量最多。绿柱石包括海蓝宝石、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从目测形状而言极易与水晶混淆，从贸易价值来看，比水晶稀有，也更不宜加工。东汉时期串饰中的透明宝石数量开始增多，甚至超过肉红石髓，说明风尚的改变。

琥珀是合浦汉墓中常见的有机宝石。从周边出土情况来看，西汉时期以透明的黄色、淡红色的琥珀为主，其原料应该是来自波罗的海。而到西汉晚期至东汉，酒红色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琥珀数量剧增，直接说明其原料产地发生了变化。

贵重金属串饰数量也为数不少，主要以金珠为主，有少量银质珠、银管。另有少量白色系透闪石玉质、绿色系绿松石类动物、器具型的微雕。

（二）形制划分

串饰不能仅仅以材质的绚丽色泽取悦人们的欢心，在贸易经济的驱动下，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产品外观进入审美的单一和疲劳时，串饰设计和制作者需要带有更新颖的巧思来重新博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我们能通过形制的排比，觉察到这些微小饰品在时

间的长河中“进化”的过程。合浦珠串饰形式颇为多样，几乎囊括了常见形制，以外形加以区别可分为管珠型和微雕型。

以数量最多的管和珠来看，通常认为：短、圆者可称为珠，长、尖者称为管为妥。造型以球形、矮鼓形、或长或短的枣核形、柱形、多棱柱形、水滴形（或称“棒槌形”）、纺锥形、随形、瓜棱形等为常见。依据各类质地不同，选取的造型也不尽一致。如玻璃管珠常见球形、扁球形、长柱管形，均在西汉晚期出现。珠的颜色以暗红色、深蓝色和绿色居多，长柱管以蓝绿色、绿色透明为主，出现时代比珠略晚（南越王墓零星出现的蓝色玻璃珠除外）。

玛瑙类中，主要器型是管，其中肉红色石髓有些球形珠，大部分制成或长或短的枣核形、多棱柱形、棒槌形及纺锥形的管；缠丝类却只是矮鼓形、长枣核形或短枣核形为主，少量棒槌形。缠丝类管是中国南部地区出现的最早的串饰类型，最迟在西汉早期已进入内陆；肉红色石管珠髓稍晚，大致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流行开来。蚀刻珠一般取用较为纯色的褐色玛瑙矮鼓形、长枣核形管或短枣核形管为基体，利用管中部凸棱位置蚀出白色花纹，起到凸显纹饰的效果。足球形蚀刻所见皆为球形，以纯黑色玛瑙为基体（图6-10）。



图6-10 广西贵港鱼种场M1出土的蚀花珠

水晶也多见是稍短小的管、珠类，以矮鼓形、长枣核形或短枣核形、多棱柱形为常见；棱纺锥形的珠多由紫水晶制成。绿柱石、尖晶石(?)以随其结晶状的扁珠、短多棱管为主。以上透明珠、管的始盛年代在西汉中晚期。石榴石质地多见于东汉时代，因受到材质的限制，较大的管形近乎不见，只见到颗粒小的圆珠，或是在两端稍有磨凸的串珠（此类珠子是否具有器具形微雕的意义尚待研究）。

分为两类形状的琥珀材料，在稍早的西汉时出现黄色透明、扁而短小、随形的珠；西汉晚期到东汉，酒红色半透明的新琥珀材料的出现，同时伴随出现了瓜棱形、扁球形、长水滴形的珠子。

在西汉晚期出现，一直延续到东汉的贵金属金珠以镂空的多面形、瓜棱形、纺锥形、长水滴形、枣核多棱柱形为常见；金珠表面焊细小炸珠，造型多样，层次丰富。而银珠鲜有发现，仅见有长水滴形长珠一串。

微雕造型多样，除了选取常见的卧兽，鸟禽类、器具类甚至小型的印章也穿入串饰之中。合浦地区微雕出现在西汉中期，造型是肉红色石髓雕刻的卧兽，同类卧兽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其中还发现过禽鸟类、摩羯鱼（鱼龙）的造型（见本书第四章）；当地也发现了石榴子石雕刻的卧兽，时代均在两汉之交。以上造型至东汉后，选料几乎被琥珀雕件所替代（图 6-11）。器具形微雕仅见连胜、小壶两类，出现于西汉中晚期，选料以琥珀、玉和玻璃为主。另外，在合浦还发现少量未经穿孔的半宝石珠饰，其是否暗示着合浦曾经存在串饰的次加工作坊，还有待当地考古工作及科技考古观测的深入。



图 6-11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的微雕（西汉晚期）

（三）文化内涵

合浦出土的串饰与微雕的位置绝大多数位于墓主人周边，即所谓装身饰品。顾名思义，它们是最贴近人们身体的装饰，如佩挂在脖子上的项链、环在手臂或者腕上的手串；而男性对传统玉质品热爱的同时，还将串饰锦上添花地点缀到随身的刀剑物品上。这些小型且制作精巧的工艺品逐步盛行，是因海上贸易所引进的外来文明更多地影响了时人对于美的重新审视。

从时空上来看，合浦大型墓葬兴起恰处于汉帝国向海外拓展的时间节点上。上文探讨过，中原人士的南迁促进合浦地方原有经济模式从单一的采集天然珍珠转向海外贸易的突变，并伴随着这些大型墓葬的突然出现，不仅表明地方贫富分化的加大，而且从侧面展示了在短时期内海洋贸易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墓葬中的葬式与随葬品也反映出墓主原本的文化属性。

在合浦西汉中期及东汉早期的大型墓葬里，发现葬具头部均置有玉擘或类玉璧的设施。

如风门岭 M27 棺头置璧，风门岭 M26 棺头置饰贴金的璧（西汉中期和晚期）；合浦九只岭 M6a 男性棺头置有璧（图 6-12），望牛岭 M5 两棺棺头皆悬玉璧（东汉早期）。从广义上来看，葬具与璧的组合是东周楚人的葬仪之一^[24]，此后汉帝国继承下来，尤以南方的湖北、湖南及长江下游沿岸的楚国故地最根深蒂固。一般来说，玉璧可以放于棺内敛尸，亦可悬于棺之头档部位。细观上述墓葬的璧的出土方位，并不与通常棺内出土品发生关联，最合理的解释是原本悬于葬具头档，如此现象可以肯定是承脉楚人仪轨的悬璧丧葬制度。^[25, 26]

上述墓葬里的随葬明器中，滑石器占有很大比例，这是西汉湖南与广东番禺地区特有的丧葬习俗。^[27]故而笔者谨慎地认为西汉中期合浦的大型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是集中来自湖南或广东番禺地区，或是两地文化关联紧密的人群。他们相对较多地受湘楚文化的影响，带来了诸如同时期的墓葬结构、丧葬理念和随葬品的制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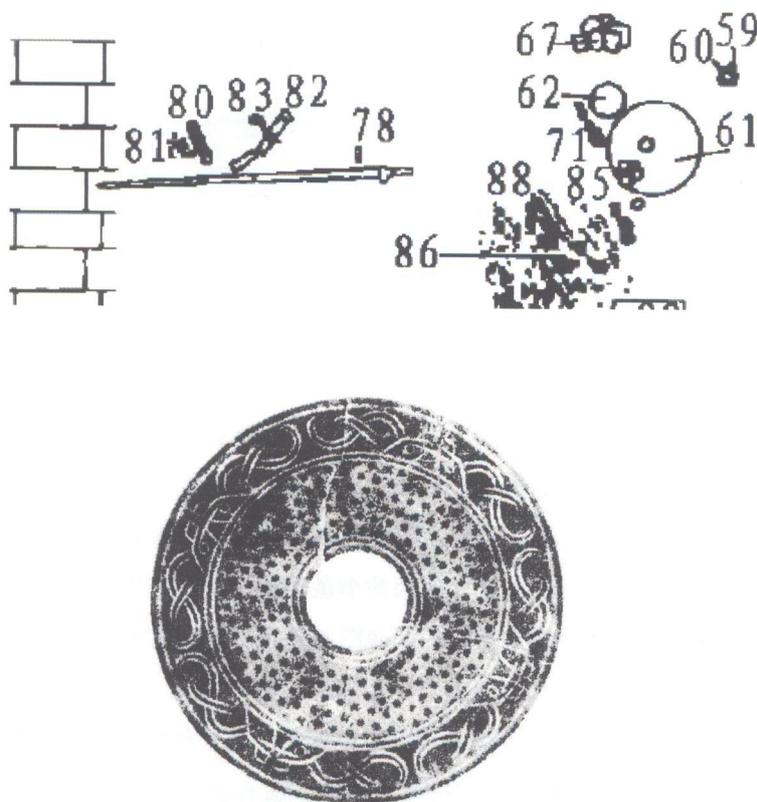


图 6-12 合浦九只岭 M6a 男性棺头置璧及其平面分布

再来看合浦出土这些串饰的象征意义。管、珠意义在时人眼中如同进口奢侈装饰，除了某些管、珠上带有人工蚀刻或是天然“眼”状纹样（虽然对于原产地的人们具有特殊宗教含义，但是对于中国人的实际意义只是特殊纹样而已）。

而那些串饰与微雕却意义非凡，下文将会谈到在海丝贸易的途中，所生产类似的微雕珠串有更丰富的形态，但汉帝国商人却有着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如最早出现的卧兽（有学者称之为“辟邪珠”）的微雕珠。纵观两广所见的串饰与微雕，卧兽始现时已是在西汉中期偏晚阶段，时间上略早于内陆。其中，两广卧兽微雕不仅发现

数量较多，而且涉及质料也十分丰富，尤其重要的是合浦凸鬼岭墓群出土的那件确定为舶来品的石榴子石狮形卧兽。兽作昂首形态，小而向前凸尖的脑袋，并有突出的眼睛；特有的纵钻孔，从其前肢一直到贯穿尾部。可以说，石榴子石雕兽显得更为立体和写实，制作者几乎能完美地捕捉到兽类扑卧时依然保持机警戒备的神态，颇为写实（见本书第四章）。从远方的消费者来看，这类有着具体神兽般造型的微雕可以赶走邪佞，保佑佩戴者的吉祥。西汉元帝时期成书的《急就章》中便有类似的描述：“系臂琅玕虎魄龙……射魃辟邪除群凶。”^[28]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所提到的两汉之际，虎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厌胜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29]

其他主题还有禽鸟、小瓶（壶）、连胜形。缠丝玛瑙及肉红石髓类禽鸟写实，因是进口产品原始意义尚不明确，但从内地仿制后的鸟形微雕来看，不外乎取自鸠、鸡甚至比翼鸟这样的汉人心中吉祥鸟类的造型。鸡可“主以御死辟恶”^[30]；鸠为不啖食之鸟，寓意长寿吉祥；比翼是赞誉爱情，同为吉祥。连胜又称为“方胜”，西汉晚期出现能够佩戴的玉胜，两个玉胜的连接处也被打磨成圆棒形，中部的穿孔可用来串联，其取形自汉代崇仰西王母头部所戴的一种发饰，寓意长生永驻；汉末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壁上就刻画了双胜的造型，被认为是祥瑞征兆之一，旁侧题刻有“玉胜，王者（后部漫漶）”的语句。^[31] 资料表明，玉胜出现在西汉末期，起初是写照形象的“双连胜”形；到了东汉，由于讖纬思想的介入，将可以代表玄化无边的盘、勺等零件加附在连胜两端，不过此时连胜形象依然能够在瑞符中看到。东汉时期最重要的改变是将原先的连胜变成平面化的“司南佩”，从而开创了胜形器的新时代。“司南佩”是有着传承延续关系的胜形饰，在有机宝石和玉质串饰中获得了新的佩用形式。东汉的墓葬中大部分作为项饰的“司南佩”^[32]，源初的造型是以上下叠压的两个台面、中部收缩细凹、横向并钻有一孔，上下两台面各琢出勺子和凹面的小盘。实际上这个造型的主体正是上下叠压的两个台面，以横向的剖面来看，单个台面的平面图更像是呈具有传说神仙法力而大为流行的胜形。

另外，蟾蜍形微雕显然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盛行的西王母图像同样关系紧密。^[33] 因为在《淮南子·精神训》中所记的“月中有蟾蜍”^[34]，其也被认为是周而复始月亮盈亏的代表者，具有长生层面的寓意。

（四）工艺传统

玻璃制品大多源自铸造，再进行次加工，两汉时期中国所见玻璃制品大多如此。据检测，在合浦发现的玻璃串饰，以钾玻璃为最多，钾玻璃很有可能是当地自制的；也有一部分属于中等钙铝和低铝类型的，推测来自东南亚及印度等地，蓝色混合碱玻璃也源自印度洋沿岸。蓝绿色、深蓝色钠钙玻璃来自地中海沿岸作坊（详见本书第五章）。当然，作为检测的结果只能表明原料的可能性产地，因为玻璃具有加热可重新塑造的特性^[35]，完全存

在大块的原料在不同贸易口岸重新融化塑形的可能，这个过程甚至也可以在合浦进行（蛙形微雕为铸造）。华美的透明多棱柱形珠的制作，是在铸造成型后，按需要的长度截成管子，就颜色和形状而言应是模仿了偏蓝色的天然绿柱石管。

就多棱管的裁截工艺而言，一些管珠及微雕饰品还进行过二次琢磨塑形的过程（在玻璃器皿工艺里称为“冷加工”）。如九只岭 M5 出土的那件微雕扁连胜（图 6-13），材质为印度洋进口玻璃，经过贸易至合浦后重新做了冷琢磨，按其目前形状推测，可能是扁球形的玻璃珠改制。



图 6-13 合浦九只岭 M5 出土的玻璃连胜形微雕

半宝石和宝石的串饰及大部分微雕，目前在合浦并未发现作坊遗址和半成品，且有些宝石料质对于两汉工匠来说尚不存在加工技术的可能，所以在此还需谨慎地认为它们均依赖贸易进口。如纯净的石榴子石硬度为莫氏 7.5 度，绿柱石硬度则高达莫氏 8 度，打孔必须借助高硬度钻头的快速钻具，但这类钻具目前在中国尚未发现。

肉红石髓是人工将含铁玉髓加热改色而得到的，该技术最早见于印度，合浦出土的少量肉红石髓圆珠通过人工琢制成为瓜棱形珠，琢痕宽大、研磨介质较为粗糙，与汉地琢玉的技术不同；同样工具在肉红石髓的微雕卧兽、鸟禽类上表现为造型率意、不拘细节的明显特征。

而从西汉晚期出现并盛行的酒红琥珀微雕上来看，相对肉红石髓的硬朗琢痕，具有更多过渡自然弧面的表现。穿孔也一改前者的前后纵向为腰侧横向，推测是节约打孔时间以提高效率，减小纵向穿长孔的危险系数。（图 6-14）



图 6-14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的两类琥珀微雕

贵金属珠饰一部分为铸造，多面金珠则是利用特殊的金属制造工艺制作，代表了高超的手工技艺水平。作为贸易珠中的重要一类，学者们研究认为中国出土的多面金珠应是制作于印度和巴基斯坦。^[36, 37]其基础工艺是利用金属间的焊接技术，在减少使用贵重金属原料的同时，构建起多层次几何珠形的结构，最后点缀金粟，其艺术创造中充满了空间几何思想。(图 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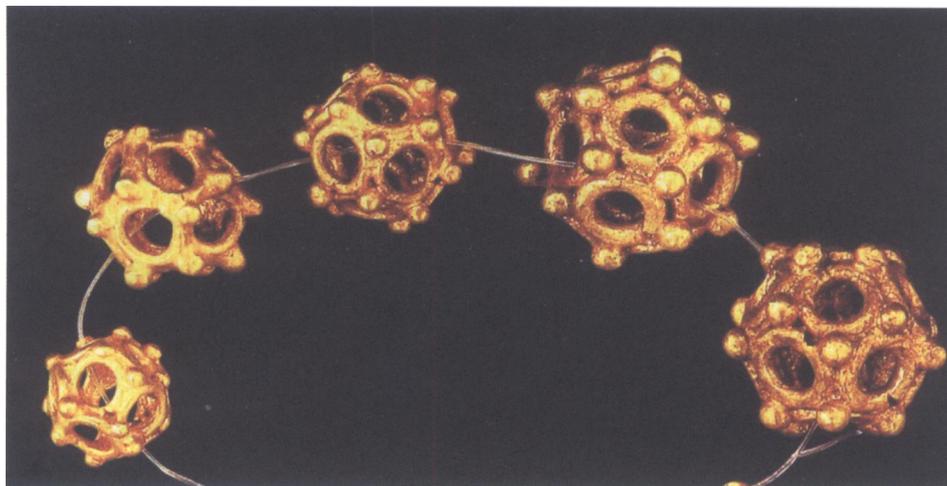


图 6-15 合浦北插江盐堆 M4 出土的多面金珠